



史学研究的 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法〕雅克·勒华天 主编

皮埃尔·塔拉

赫·名·拜

主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K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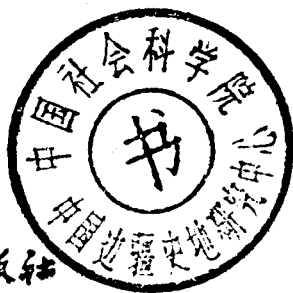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

史学研究的 新问题 新方法 新对象

——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

〔法〕 雅克·勒戈夫 主编
皮埃尔·诺拉

郝名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8

0603311

213/19

史学研究的
新问题 新方法 新对象
——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

〔法〕雅克·勒戈夫 主编

皮埃尔·诺拉

郝名玮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1202印刷厂印刷

787×1092¹/₃₂开本 11印张 244千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050-038-1/C·7 定价：3.30元

目 录

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 (代序) ……姚 蒙	(1)
前言 ……科林·卢卡斯	(35)
史学计量法 ……弗朗索瓦·菲雷	(50)
经济史：成就与展望 ……皮埃尔·肖努	(71)
论马克思主义史学 ……皮埃尔·维拉尔	(97)
气候史 ……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149)
人口学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	(176)
宗教与宗教人类学 ……阿尔方斯·迪普隆	(208)
社会史与意识形态 ……乔治·迪比	(245)
心态：一种模糊史学 ……雅克·勒戈夫	(265)
法国大革命中的节日 ……莫娜·奥苏夫	(287)
书籍史 ……罗歇·夏蒂埃 达尼埃尔·罗什	(311)
索引 ……	(334)

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

(代序)

姚蒙

从史学学科演进的特点来观察，我们可以将20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学看作一个整体。这样，法国当代史学这一概念就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一个内容的概念：这一史学既不同于19世纪史学，又与以往各时期的史学形成鲜明对照。但只是到了70年代，法国史学界才开始对本国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史学发展作比较系统的总结、估价和反思。在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指出三本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由J.勒戈夫(J. Le Goff)、P.诺拉(P. Nora)主编的《研究历史》(1974年版)(或译作《构造历史》，原文为《Faire de l'Histoire》；英文译本题名为《Constructing the Past》，中文译本改名为《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由J.勒戈夫、R.夏蒂埃(R. Chartier)和J.雷韦尔(J. Revel)主编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1978年版)；由A.比尔吉埃尔(A. Burguière)主编的《历史科学辞典》(1968年版)。这三本著作的重点各不相同：《研究历史》对当代史学各主要方面进行重点深入的探讨；《新史学》以重点探讨和更为广泛地概括介绍(用词条形

0000627

1

式)来集中体现史学新潮流;《历史科学辞典》则以辞典形式对至20世纪80年代为止的法国和西方史学作一分阶段的总结性概览。一百几十位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这三部作品中以集体的努力向人们展示了当代法国和西方史学的大致图景。由于是专家们执笔,这三部全景式的著作在对史学各领域进展的论述、分析上有着一般史学史书籍所缺乏的深刻性和清晰性。

本书译文即是根据《研究历史》一书的简缩英译本译出。法文原本于1974年由法国加利马尔(Gallimard,这是一个出版学术著作的著名出版社)出版社出版。在此书出版前后,法国史学界正面临新的变动:首先是年鉴派核心集团的更新:L.勒戈夫、E.勒鲁瓦·拉迪里(E. Le Roy Ladurie)、M.费罗(M. Ferro)等第三代年鉴派在年鉴杂志编辑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则正逐步退居幕后。其次,早先以年鉴派为集中代表的史学新潮流已经全面渗入史学各领域、各学派,一个新的史学规范已经确立并不断通过史学研究的成果而得到巩固、发展。到70年代,新史学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对这一史学的总结、估价也就显得格外迫切。第三,随着法国当代史学新规范的全面确定,年鉴派的学派性也就开始逐渐消失(年鉴派的学派概念应当相对于传统史学规范来认识,下面还要略略谈到这一点)。这有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年鉴派的倾向日益成为法国当代史学的一股潮流,年鉴派本身溶入了法国当代史学各领域的具体研究中;二是其他史学潮流也在自身不断革新的同时影响着年鉴派,从而使年鉴派也发生着变化。但在这相互交流和影响中还有着不可避免的学派冲

突，写作《研究历史》（主编者J.勒戈夫、P.诺拉是第三代年鉴派的核心人物）也有着这一背景。从上述各方面来看，由年鉴派核心人员来对20世纪法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全面估价这一工作也就势在必行了。此外，从史学发展的战略角度观察，《研究历史》一书也很有意义：70年代法国当代史学面临新的分化与进一步的更新，史学家们需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从而规划未来的发展前景。

J.勒戈夫和P.诺拉作为《研究历史》一书的主编曾在“编者前言”中强调过此书的特点。他们指出编著此书并不等于对目前史学作一个完整的全景描绘，因为“当今，史学领域毫无界限”，因而这本集体编写的著作只希望勾勒和推动一种新的史学类型。他们认为：对当代史学所作的这些分析并不是来自于史学外部，而是史学家自己研究和思考的体会、总结。他们还强调：这本书“并不代表着一个史学家团体或一个学派，如果人们在此书作者笔下或此书的观念倾向中找到常被人们称之为年鉴学派的印记的话，那是因为新史学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归功于布罗代尔，也归功于那些继续在这条革新道路上走下去的人们。但是此书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正统条规，因而这部作品是最为开放的”。统览全书，我们觉得主编的话还是与实际相符的。《研究历史》原著分三卷，共33位学者参加编写，除两篇文章每一篇为两人合写外，其余都是一人一篇，所以合计共31篇文章。这31篇文章相应地分为三个方面，也就是此书的三卷：第一卷《新问题》、第二卷《新途径》、第三卷《新对象》。编者这么说道：“对于我们来说，史学革新集中在三个方面：新的研究问题对史学本身提出了疑问；新的研究途径改善着、丰富着

或彻底变更着史学的传统领域；在史学认识论范围中则涌现出一系列的新对象。”^①对史学进展及其成果作这样的划分使人们增强了观察的系统性。

《研究历史》三卷出版后立即引起法国与西方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一些重要史学杂志纷纷发表书评，称此书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而对当代史学作出深刻分析的典范作品。在一般读者中，此书也很畅销，甚至13年后的今天，法国还以简装本重新再版。无论从资料角度还是从史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部书的价值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史学评论。

英译本只选择了此书31篇文章中的10篇：第一卷《新问题》中的《史学计量法》、《社会史与意识形态》、《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等3篇；第二卷《新途径》中的《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人口学》、《宗教与宗教人类学》等3篇；第三卷《新对象》中的《气候史》、《心态：一种模糊史学》、《法国大革命中的节日》、《书籍史》等4篇。这一选择较偏重于具体领域的研究、且较注意已取得了相当进展的领域，而对一些探讨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文章〔如M.德塞尔托（M.de Certeau）、R.韦纳（P.Veyne）两人的论文就没有被收入〕和反映70年代一些新趋势的文章〔如《政治》、《事件的回复》等〕则有所忽略。当然要选择就必然有舍弃，英译本的这一编排反映了英译本编译者的需要标准。

10篇文章反映了法国当代史学的10个方面，中文译本的出版将给中国史学界、学术界以及关心史学的人们直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这对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促进相互借鉴是大有助益的。我们注意到，虽然目前国内史学界正努力增进对

① 以上引言均见法文原本《研究历史》“编者前言”。

当代西方史学的了解，但重点似还偏于历史哲学一端。而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发展已几乎完全脱离了历史哲学（不论是克罗齐、柯林伍德还是汤恩比、雷蒙·阿隆）的范围。正如我们无法通过哲学去了解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一样，我们也无法通过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来了解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演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学就与哲学无关，这些关系还正是我们应当去努力探索清楚的）。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切实掌握法国与西方史学状况的一些信息。然而10篇文章还难以展现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全貌。英译本在这方面的缺陷也是法文原著的缺陷：不管是《研究历史》、《新史学》还是《历史科学辞典》，这些著作的形式都是集体写作以保证既有宽广的涉及面又有论述的深刻性。但集体写作的分散性，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与个人倾向的多元化等也是事实。此外，这种写法对于身在潮流中的法国与西方史学家们来说颇为合适，因为他们熟悉背景，了解所论及的方面的潜在结构；但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免显得突兀、生疏一些。为了给本书读者提供一些背景知识以对本书各文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我们拟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方面扼要分析一下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和变迁。

*

*

*

一、概念：“年鉴派”与法国当代史学主流

分析法国当代史学的整体规范（或曰范型）就无法不论及年鉴派。只要注意一下就可看到《研究历史》、《新史学》和《历史科学辞典》这三部重要作品的主编者都是属于年鉴派：J.勒戈夫是第三代年鉴派的核心人物；R.诺拉是年鉴派在出版界的代表（其本人也是近、现代史专家）；A.比尔吉埃

尔、J.雷韦尔、R.夏蒂埃则是年鉴派新一代（有人将他们称为第四代）的代表。确实，在有关法国当代史学的一些专著与论文中（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这类专著与论文的数量都还是极有限的）人们曾多次提出这一问题：年鉴派与法国当代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有关法国当代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美国史学家T.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rich）所作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型》一书^①将年鉴派看作是法国当代史学的唯一代表，英国史学家C.卢卡斯（Lucas）也在本书英译本引言中将整个法国史学新潮流看作是一个以年鉴派发展为主线的史学趋势。

什么是“年鉴派”？这一概念一般是指由M.布洛赫、L.费弗尔等在20年代创立的、围绕年鉴杂志（最先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最后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史学家集团，以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又成为这一集团的核心基地。但这样的定义还缺乏精确性：首先，杂志与学术机构可能只是一种史学流派的外部标志；其次，一旦深入观察年鉴派主要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并将其与法国当代史学其他一些杰出人物相比较的话，人们还是会找到不少共同点的；第三，当整体考察法国当代史学的演进时，我们会发现随着经济史学范型（特别是19世纪的实证史学）的崩溃与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年鉴派的学派性也同时日趋淡化；从另一方面看，许多其他史学流派也日益带上原先只属于年鉴派的印记。70年代起这一趋势开始更为明显地显示了出来；第四，深入分析年鉴派的理论，人们便会观察、把握

^① 英语原文为《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美国伊萨卡1977年版。

住法国当代史学范型的基本要点，年鉴派的演进在实际上构成了法国当代史学演进的基础（特别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年鉴派是一个倡导革新的史学家团体，在旧史学规范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一团体必须以学派的形式来积聚力量、从而突破传统史学的规范、建立新规范（因为特定的史学规范不仅表现在理论、思想上，还表现在对学术机构、学术界各层次的统治上）。但随着二战后法国史学新范型的全面确立，随着新史学从支流变为主流并渗入整个史学界，年鉴派的学派性也就随之淡化了。年鉴杂志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也只是新史学的突出标志之一。年鉴杂志主编之一A.比尔·吉埃尔在1979年庆祝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曾这样明确地表示：“今天，年鉴学派的遗产已不再只属于这本杂志了，它已成为大部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这是令人高兴的。创新已不再是一小伙人的专利。”^①因此，我们认为对年鉴派的理解应当超出对一般历史学学派的理解，与其说它是一个封闭性的、与其他学派相对应的学派，不如说它是一个旨在创立史学新范型、推动史学更新的运动。这一运动汇集了其他史学新潮流而构成了法国当代史学的主流。正是在这一含义上，勒戈夫不久前曾如此说过：“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希望继续存在与发展。”^②正是勒戈夫和其他一些史学家于70年代提出“新史学”一词，以囊括在年鉴派研究倾向下的所有史学新潮流。《研究历史》一书是这一新潮流的产物。而这一新潮流之

① 见《年鉴学派与杂志》一文，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9年第6期。

② 见作者对J·勒戈夫采访记实，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第69页。

所以能够代表着法国当代的主流，却是以其理论的完整性、规范性为基础的。

二、产生背景：实证史学的危机

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理论规范是在与实证史学的传统史学规范相对抗的条件下产生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实证史学反映了史学学科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史学潮流以德国的兰克(Ranke)学派为集中代表，在西欧史学界统治了近一个世纪。实证史学的特点和主要主张是：历史研究是史学家客观地反映历史的过程，是史料自己说话的过程。史学家的职能只是严格考证、挑选和排列史料，使其让人理解。因此史学家只是反映历史的镜子：“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说话。”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是文字资料，尤其是各种档案、官方文献、传记等。在这种资料基础上所写就的历史就不能不是政治、军事、外交史和杰出人物的活动史。这种历史的表现方法是描述性的、叙述性的。应当看到，这种实证史学潮流是在19世纪科学与哲学的特定背景中企图使史学摆脱文学、哲学等干扰从而全面学科化、科学化的尝试。结合各史学研究组织的建立，这一潮流形成了当时史学研究的主导倾向和完整范型，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法国，人们就可举出F.古朗热(F. Goulanges)、G.莫诺(Monod)、J. v. 迪律伊(Duruy)、E.拉维斯(Lavisse)、A.伦博(Rimbaud)、c.朗格卢瓦(Langlois)、C.塞纽博斯(Seignobos)等一大批成果卓著的著名史学家。

但是实证史学模式与范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①已开始面临危机。这一危机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从内部危机来看，实证史学的一系列信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暴露出日益明显的弱点：强调史料的齐全和完整无缺虽然在史学方法论中

有极重要的意义，但在实际上却难以真正实现。这不仅因为史料本身的被发现是一个无限延续的过程（尤其相对于要在特定时段中完成的史学写作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史料的概念在不断地被更新，还因为研究者事实上并不能使用全部的史料。任何历史写作都建立在对史料的选择上，正是这一选择才对史学家的客观性提出了疑问。实证史学对史料完备性的追求又使史学逐渐蜕变为史料学，从而史学研究的微观化也就成为实证史学方法的必然结果：选题越小就越有把握全部材料的可能，但同时史学就日益失去了其整体性。实证史学还表现为史学领域的狭窄，政治、军事、外交、杰出人物的行动等研究重点正受到当时社会运动的冲击，人们注意到现实社会并不是光由这些因素所组成的。对于复杂的社会运动，实证史学所提供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实证史学又在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冲突、矛盾中担当了为本国利益服务的角色〔如古朗热与德国史学家蒙森（T. Mommsen）就法德边界问题的著名论战〕。在本国的社会、政治进程中往往为世俗化等种种意识形态服务。要求不偏不倚、尽量宏观的理论信条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实际研究，不能不使新一代史学家对这一实证史学范型产生了怀疑。

实证史学模式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外部挑战。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一些哲学思潮对史学的地位、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可能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从而形成了与以往康德、黑格尔等人不同的历史哲学。如果说以往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原则和意义的话，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则常常对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的性质进行分析。哲学思潮从思辩到分析的演进是导致历史哲学这一转变的基本原因，但19世纪史学的学科独立化也对之产生了影响；在史学

专业化的条件下，哲学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就必须首先对表现历史的历史学进行反思。但从整体看，这些哲学的、外在的反思却朝着否定史学科学性、独立性方向发展，并力图重新使史学哲学化。我们从狄尔泰（W. Dilthey）、德国西南学派（如温德尔班德 W. Windelband）、李凯尔特（H. Rickert）、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的著述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毋庸讳言，这些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常常以其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启示着新一代的史学家们，使其更加认识到变革史学的必要性。

19世纪到20世纪也是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发生、发展和相继独立的时期，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既丰富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又对史学的优势地位发出挑战。在法国，社会学成了实证史学的主要论敌。以迪尔凯姆（E. 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学派着重对社会整体结构及各层次社会现象的实证分析，他们将史学视作是社会学的辅助学科。由于实证史学强调史学对特殊事件研究的特殊性，强调史学家的被动及历史运动的偶发性，社会学便借此贬低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迪尔凯姆在《社会学年鉴》创刊号（1898年）上宣称：“历史学只有在解释的范围内才是一种科学，而人们也只有在比较的同时才能解释……然而一旦开始比较，史学则与社会学毫无区别。”因此，社会学完全可以取代历史学。实证史学曾以强调史学的特殊性来维护史学学科地位，但随之而引起的学科封闭性却又阻碍了史学的进步发展，并导致史学地位相比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而言的衰落。

实证史学范型的危机同时预示着新史学的诞生。H. 贝尔（H. Berr）、F. 西米昂（F. Simiand）、G. 勒费弗尔（G.

Lefebvre)等人已从各个方面对旧有史学模式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以各自的理论来更新史学。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创刊标志着新史学范型开始形成,在M.布洛赫、L.费弗尔等人的活动下,围绕此杂志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历史研究集团,这一集团后来便被称为“年鉴派”。从30年代起,年鉴派集中代表了法国史学的各种新潮流,开始逐步摧毁旧的史学模式,推广新的史学规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史学终于确定了其主导地位,整个法国史学开始以一种新的范型中朝不同于以往的方向、以不同于以往的节奏、频率与速度演进、展开着。

三、新史学本体论

我们在此就本体论(ontologie)一词最广泛的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16世纪这一名词的出现便是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而逐步地、部份地取代着原先的“形而上学”(或玄学, métaphysique)一词。从狭义讲,本体论意味着对世界本源、本性问题所进行的哲学(或神学)研究;从广义讲,本体论是有关存在的理论和学说。广义的本体论用于各个特定学科,常意指有关这一学科的一系列最为基本的问题。史学本体论,即是首先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学是什么?

在每一个历史和历史学演进的重要时期,人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有系统或无系统地对历史学的性质提出疑问,因为不管是什么时代,集体记忆或对集体活动轨迹的探寻总是一个人类社会特定意识的重要部份。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在本体论层次坚持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演进、变动的根本趋势,力图使史学占据一种科学的地位。年鉴派在战前创建新史学范型时就已明确提出:“历史学是关

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①实证史学事实上也朝史学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首先实证史学所依据的科学观念是19世纪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分门别类分隔研究构成了实证史学科学观的核心，“观察——积累——形成科学”，这一模式正是史学家们所身体力行的。但是实证史学在史观方面强调历史的偶发性、无规律性；在具体研究上局限于历史的某些层次（政治、军事等），并拒绝综合和明确的解释等，又使史学科学化受到了极大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实证史学很少对历史学本体论作理论探讨，虽然这是实证史学力图与哲学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但却给各种反对史学科学化的理论留下了余地。狄尔泰、温德尔班德、柯林伍德、克罗齐等都是从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层次展开论述的。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主流在继承实证史学科学化倾向的同时使之更为明确、更为清晰了。

史学是科学，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象的差异：史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这里的人是复数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布洛赫指出：“作为单数的人适合于抽象表达，而复数的人更好些。人的复数是相对性的语法表达方式，它适合于一种多样性的科学。在自然风光的显著特征背后、在工具与机器的背后、在表面上最为凝聚不动的文字记载背后、在表面上最完全脱离了曾将其建立的力量和制度的后面，正是复数的人才是历史学所要把握的。”史学所研究的是人又是历史的、变动着的人，“我们已经认识到人同样经历了许多变化；从精神观念的变化直到其

① 见 L. 费弗尔，《为史学而战斗》(Combats pour l'Histoire)，巴黎 1953年版，第12页。

身体的最微妙的生物学变化。”^①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史学具有着其学科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使史学不能简单比附于自然科学：“从本质上来说，人类行为是一些很微妙的现象，其中很多是超脱于数学度量范围之外的。”^②布洛赫接着将自然科学研究者与历史研究者的区别比作是铣工和弦乐器制造者的区别：一个靠精密仪器，一个靠耳朵与手指。从而既不需要铣工对弦乐器制造者的实证方法表示满意，也不需要后者去笨拙地模仿前者。而实证史学在力图使史学科学化的同时却夸大了这种史学的特殊性，从而在理论上使史学科学化受到阻碍。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在他们著名的《历史研究引论》中说道：“科学的直接观察是作用于现实的和完整的对象上，”而“历史呢，我们只从文字记载中、有时也从建筑或人工产品中才见到一点真实。”因而，历史研究就“不是一种使人发现现实对象的客观方法，而只是一种主观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窥见组成我们印象的抽象方法。”^③实证史学的这种看法及其具体研究成果都给相对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提供了材料。而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却在坚持上述史学特殊性的同时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从而否定历史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法国当代史学认为史学所具有的特殊性只是一种学科层次的特殊性，如物理学相对于化学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反之亦然，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尽管如此，在各学科的研究中还是有着共同的科学性。布洛赫曾精辟地指出：“一门科学并不完全根据

① 见 M. 布洛赫：《为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巴黎 1976 年新版，第 35、46 页。

② C. - V. 朗格卢瓦和 C. 塞纽博斯：《历史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des Etudes Historiques），巴黎 1898 年版，第 185—186 页。